

JINGJI LUNLI YU
SHEHUI BIANQIAN

经济伦理 与社会变迁



陈 钧 任 放 著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目 录

导 论 为经济伦理塑像.....	(1)
一、韦伯的贡献及其留下的遗憾	(2)
二、经济伦理的概念阐释	(4)
三、经济伦理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结构性元素	(6)
四、经济—伦理的互动关系	(9)
五、经济伦理的泛文化效应.....	(13)
第一章 中国古代经济伦理发覆	(16)
第一节 文化源点时代	(17)
一、人化·文化.....	(18)
二、尚农精神.....	(20)
三、礼制垂范.....	(25)
四、对“义”与“利”的哲学思考.....	(27)
第二节 经济伦理的原型	(34)
一、以义生利、勤劳敬业的生产行为	(35)
二、恪守礼制、以德驭众的管理行为	(45)
三、大同均衡、取予有道的分配行为	(54)
四、力戒奢侈、崇尚节俭的消费行为	(61)
五、反对竞争、讲求诚信的交换行为	(65)
六、爱民富民、重本抑末的决策行为	(72)

第三节 来自思想界的三次大的颤动	(83)
一、汉代:孔子成为经济伦理的宗师	(83)
二、宋代:商品扩张与伦理建构	(91)
三、明清:对传统经济伦理的再认识	(98)
第四节 在权力圈的盈缩之间	(107)
一、治术中的经济伦理	(107)
二、社会变动的一种活性基因	(115)
第五节 社会俗态与经济伦理	(121)
一、婚嫁喜庆中的“财”与“礼”	(121)
二、古代教子中的“名”与“利”	(125)
三、丧葬仪式中的“重孝”与“厚葬”	(130)
四、年节俗闹气中的“天理”与“人欲”	(133)
五、明清民歌中的“情”与“利”	(136)
六、风尘仆仆话徽商	(139)
结语 源点模式·秩序情结及其它	(153)
第二章 经济伦理的近代嬗变	(159)
第一节 风气未开	(159)
一、先进者的滞后性	(160)
二、不道德的鸦片贸易	(179)
三、广东民众的经济伦理心态	(184)
四、时论·决策	(187)
第二节 近代经济伦理诸形态	(207)
一、以中体西用为轴心的洋务—改良派的经济 伦理	(208)
二、困守传统的保守—顽固派的经济伦理	(231)
三、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维新—革命派的经济 伦理	(238)
四、以宗教伦理为指归的太平天国的经济伦理	(256)

第三节 经济伦理与经济操作.....	(262)
一、政企不分的洋务工业	(263)
二、上谕:商总其事,官为保护	(292)
三、居住在道德家园里的民族资本家	(310)
结语 转型期的晕眩反应与规范需求.....	(325)
第三章 资本主义炼狱.....	(329)
第一节 古希腊罗马的经济伦理.....	(330)
一、富于知性、德性、神性的劳动—财富观念	(330)
二、符合中庸之道的节制思想	(339)
三、推崇公正原则与诚信品德	(342)
四、基于仁慈与互助的博施姿态	(346)
五、经济行为中的奉法精神	(348)
第二节 西方早期资本主义兴起的文化动因.....	(352)
一、新教伦理:劳动天职观与禁欲精神.....	(353)
二、以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为双翼的经济自由 主义	(360)
三、从自然法角度论证财产私有权的道德合理性	(373)
四、市场经济三原则:理性·公正·诚信.....	(379)
第三节 东亚经济成就与经济伦理.....	(386)
一、勤劳敬业:儒家文化圈的工作伦理.....	(388)
二、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家族—集团主义	(392)
三、礼制、秩序与政府干预经济.....	(399)
四、诚信·公正·节俭	(404)
五、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	(407)
结语 文化模式的多元化与文化激励机制.....	(410)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经济伦理研究.....	(414)
第一节 经典作家如是说.....	(415)
一、不劳动者不得食	(415)

二、“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	(422)
三、计划经济的三大伦理精神:纪律·权威·集体	(427)
四、劳动平等 报酬平等	(431)
五、用善的竞赛取代恶的竞争	(434)
六、艰苦朴素	(436)
第二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呼唤的经济伦理	(437)
一、勤劳敬业、按劳分配、共同富裕的劳动—— 财富观	(438)
二、市场主体的行为准则:理性·平等·公正· 诚信·集体	(441)
三、自觉维护竞争行为的合义性	(446)
四、权威·纪律·秩序:政府宏观调控的道德 支撑点	(448)
五、富国利民:经济决策的道德坐标	(452)
六、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企业伦理之魂	(454)
七、经济民主·经济自由·奉法精神	(458)
八、提倡廉洁、节俭,摒弃金钱价值观	(463)
结语 市场经济是伦理型经济	(466)
后 记	(469)

导论 为经济伦理塑像

在时空交迭、生命流转、文化变迁的过程中,经济伦理始终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它既是人类创造冲动和人格自塑的结晶,同时又在不同层面上影响着人类的创造冲动和人格自塑。这意味着,它被创造,同时又创造。从被创造的角度看,经济伦理的根须深深地掩埋在经济——道德生活的土壤之中,充分吮吸着从工具形态、实践媒介到社会组织、心灵自觉诸方面的水份和营养,受到一系列相关的假设与前提的制约。从创造的角度看,一方面它以一只看不见的手雕琢着经济——道德生活的各种文化范式,将自己的特质与功能传播给同一或不同文化圈内的人们,将自己对象化在特定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它又在雕琢文化范式的过程中完成着自己,不断地调整、建构、完善自己与时代的关系,积极地寻觅、审视、确定自己在文明衍化历程中的位置。

经济伦理一直没有自己的领地和城堡,然而它对历史发展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宛若一位无冕之王。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人们对经济伦理历来不够重视,即使知识界也只有少数学人涉足这一领域。这一状况的负面值不仅波及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文化导向、制度模型、整合趋势,而且使学术研究的上空漂浮着一层阴霾,导致经济研究与伦理研究严重割裂,不利于拓展视野、深化认识、探寻本源、追求真理。因此,应该把经济伦理作为一种具有相对

独立性的现象予以解剖,从各个方面辨识它的真相、把握它的本质。经济与伦理的携手也许将导致学术研究格局的某种突破,因为这将深刻地影响到众多边缘学科从方法、观点到体系的反思与重构。

那么,经济伦理到底是什么呢?

一、韦伯的贡献及其留下的遗憾

当你着手从文化角度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时候,你不能不谈韦伯,尤其是涉及“经济伦理”,韦伯的著作具有权威性的启迪意义。

马克斯·韦伯(1864—1920年)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大体说来,韦伯最先使用“经济伦理”一词。他在考察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时对经济伦理的作用给予了高度重视,指出:“产生资本主义的因素是具有合理的记帐、合理的技术和理性法的那种合理的永久性的经营,但也不独是这些。必然补充的因素是理性精神,对生活普遍指导的合理性以及合理性的经济伦理。”^① 据我们统计,在韦伯最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经济伦理”出现了六次。韦伯开拓性的研究成果已经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例如有两本专门研讨中国经济伦理的专著在80年代末脱颖而出,它们的创作动因均源自韦伯:一本是余英时撰写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另一本是张鸿翼撰写的《儒家经济伦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余著提出的中心问题是:中国儒、释、道三

^① 《文明的历史脚步——韦伯文集》,黄宪起、张晓玲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7月第1版,第156页。

教的伦理观念对明清的商业发展是否曾发生过推动的作用?作者并不讳言这是“韦伯式”的问题。张著对儒家经济伦理的内容进行了缜密的论析,细分为六个方面,即经济运行的道德法则、经济关系的道德原则、经济行为的道德规范、经济政策的道德准则、经济管理的道德手段、经济生活的道德价值。

韦伯对经济伦理的研究有筚路蓝缕之功,但是他未曾给经济伦理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他只是模糊地提及,所谓宗教经济伦理是指“在宗教的心理和实用的脉络之下促成行动的实际动机”,^①这一解说显然不能令人满意,而且给学术界带来了认识上的混乱。迄今为止,人们对经济伦理仍然缺乏共识,或认为经济伦理是“关于社会经济发展和经济生活中的道德价值和道德规范的思想,以及由此所熏陶培养的人们的社会经济心态”;^②或认为经济伦理是就“宗教观念影响经济行为的问题而言”^③等等。概念的模糊使韦伯没有对经济伦理的学术价值作出哲学层次上的表述与把握。经济伦理在韦伯的学术生涯中并未构成他始终关注的中心,这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研究的深入。对不同文化圈的经济伦理,韦伯的比较研究也缺乏说服力,失之于片面和肤浅。尽管几十年来经济伦理的轰动效应长时间地留给了韦伯,但是韦伯尚无能力为经济伦理的研究划上句号,从方法到视野的拓展成为当代学子必须认真完成的工作。站在韦伯的肩膀上而不是仰视韦伯,才能使我们作出超越性的研究。

①② 张鸿翼:《儒家经济伦理》第3页。

③ 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第61页,“自序”。

二、经济伦理的概念阐释

经济伦理,这似乎是一个朦胧、幽深、捉摸不定的概念。在词语的密林里,经济伦理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合成词,属于尚未被人们普遍认知的新生代。我们注意到经济伦理长期被肢解的不幸事实。但是,我们不打算从经济学或伦理学那里寻找经济伦理的身份证。诚然,从概念上看,经济伦理是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叛逆,在它的身上有着明显的知识传承印痕。经济伦理作为一个具有独特价值积淀的人文概念一经形成,便注定摆脱羁绊独自远行,去寻找自己久已湮灭的历史故事或谱系,去寻找每一个已知或未知的生存空间,去寻找知音和归宿。

到了为经济伦理正名的时候了。

我们认为,经济伦理是一个专门用来表述经济行为与伦理规范两者关系的边际概念。经济伦理的实质性含义是经济行为背后的伦理动因,是伦理道德原则对经济行为的制约力。简言之,经济伦理所探讨的就是人们如何运用特定的伦理道德原则去指导、规范群体或个体的经济行为。应该看到,影响或制约经济行为的动因绝非只有一个,往往是一束,其中既有经济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在非经济因素中,伦理规范对经济行为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容易而且时常被人们所忽视。经济伦理无暇顾及影响经济行为的每一个动因,它的理论视野仅仅落在制约经济行为的非经济因素范围,而且仅仅审视那些对人们现实的经济行为具有效力的伦理道德原则。从另一个角度看,经济伦理所扮演的是这样一个角色:它既不关注纯粹的经济问题,也不切入纯粹的伦理范畴,而是偏重于将经济与伦理同时置于认识网络之中,作为相互映照、彼此关联的有机整体予以全方位的审视与道德判定,以确立总体性

的价值导向与行为准则,并且能够有效地指导经济实践与现实人生。一般而论,经济伦理首先是积淀于人们内心深处的一种思想观念、一种行为动机或者一种社会心态,其次才会转化为人们的实践行为。而且,伦理规范对经济行为的制约或影响在总体上会产生两种相反的结果:或为助力,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或为阻力,阻碍社会经济向前发展。

从文化史和文化哲学的角度讲,经济伦理既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认识范畴,又是一种涵容丰富历史遗产的文化现象;既是人类繁衍与进化的产物与标识,又是不同文化圈生成与发展的源点与驱动力;既是人类对经济与道德互动关系的一种辩证把握与价值判断,又是积淀于人类心灵深处、通过实践媒介得以凸现的意志自律与行为规范;既是一种由思想家体现出来的高度自觉的思辨理性与本质概括,又是一种被社会群体普遍接受的集体无意识;既是社会经济生活得以运转、调适、置换的文化轴承,又是社会制度、组织原则、目标管理、政策导向得以确立、完善、重构的文化模板;既是人类自我认识、自我设计的主体性张扬,又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心灵多重关系的矛盾化呈现;既是文化生成可能性的内在冲动与积极追求,又是文化变迁规律性的外在展示与现实抉择;既是一种尊重传统、刻意继承的文化功能性载体,又是一种面向未来、讲求发展的文化建设方略;既是一个自我限定、业已凝聚,因此能够解剖其内在结构的过去完成时概念,又是一个自我不断拓展、充实,因此需要重新界说的现在进行时概念;既是经济学与伦理学的联宗,又是新兴学科的酵母或酶。

置身于经济伦理的定义之中,我们感受到一种黑色幽默。经济伦理几乎无所不在,人们却对它的概念无所适从。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致力于揭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在每一个经济行为或经济关系的背后,都存在着与之相关的伦理原则的磁体;反之,每一种伦理规范的社会化,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回溯到一系列经济行为

或经济关系本身。这远非是单线型的因果互动,而是一种功能同构上的逻辑链。

三、经济伦理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结构性元素

廓清经济伦理的概念并不意味着相关的问题都迎刃而解,如何在深度与广度上评判经济伦理仍然氤氲袭人。值得注意的是,导致深化认识的有效途径似乎是返归概念本身,这一颇具悖论色彩的提示恰恰证实了概念的原初性及其伸展的必要。

经济伦理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切实可感的文化实在,是人类通过物质生产和社会实践提炼而出的行为规范。作为一种历史的产物,每一个时代都具有自己独特的经济伦理,不同文化圈的经济伦理也面貌各异。这种差异性根植于经济伦理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结构性元素,即时空区域、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及价值导向。之所以将此四者称为结构性元素,是由于它们构成了一切文化现象(包括经济伦理)发生发展的条件、基础或机制。

第一,时空区域。指人类置身其中,从事文化创造、上演人生活剧的客观环境。它是一种自然——社会环境,既包括非人为的统一的客观物质世界(无机界和有机界),又包括人化了的自然环境以及广大的人类活动场所,如城市、乡村,又如城市中的社区、公园、车间、卡拉OK歌舞厅等等。时空区域在概念上不等同于一般的地理环境:它不是单纯强调环境的空间因素,而是把时间因素作为人类生存环境的一个重要变量予以吸纳,从而实现时间与空间的整合。如果仅仅考察时间因素,那么人类的文化变迁便没有着落;反之,如果仅仅强调空间因素,那么文化变迁便失去前后比较的因果联系。只有既注重历史的长、短时段,又注重历史的大、小空间,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文化研究落到实处。举凡人类的文化

创造活动,包括器物、制度、文字、婚姻等等,都是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区域产生的。离开了特定的时空区域,特定的经济伦理便无从产生。不同的时空区域为不同的经济伦理提供了不同的生存空间,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例如,在公元前 800 年到公元前 200 年的“轴心时代”,^①在东亚大陆的中国与在巴尔干半岛的希腊,经济伦理的产生与发展便面临着不同的可能性。

第二,生产方式。指人类在制造、使用工具的前提下谋取物质资料的经济行为,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社会生产是由两个方面组成,这两个方面虽然是不可分割地互相联系着,但却反映两种不同的关系,即人们对自然的关系(生产力)和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生产关系)”。^②所有的文化创造及其精神产品都是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对应物,受制于人类的实践手段与技术水平,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③就经济伦理而言,生产方式的意义在于:经济行为(关系)是伦理原则(规范)的实践源泉和载体,它揭示了观念文化根植其中的经济土壤。不同性质的经济土壤会孕育不同内涵的经济伦理,例如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势必导致不同的经济伦理应运而生。

第三,社会结构。指人类在物质实践与文化创造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组织形式,包括政治体制、经济制度、人际关系模式等等。它是一切文化现象(包括经济伦理)赖以依托的组织条件,体现了人类文化的社会性意蕴。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人不能摆脱社会结构的网络,相反地必须依附于它。人所创造的一切都离不开社会结构的制约,社会结构也因之摄取、储存了大量的文化能

^①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人的历史》。

^②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年)。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量。不同的社会结构为经济伦理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不同的社会组织基础,例如宗法制的社会结构与民主制的社会结构就为经济伦理准备了两种型号的温床。

第四,价值导向。指人类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心灵诸关系经过高度理性提炼之后形成的观念集合,是与时空区域、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相适应的符号指令系统。具有特殊内涵的价值导向是历史的产物,是文化生成与发展的规律性在人类内心深处的凝聚和升华,它植根于人类的经济生活与群体意识之中。它被人类的创造力不断锻造,同时又深刻地牵引着人类创造力的发挥,突出地展示了人类道德自律的根据、手段与方向。在同一文化圈内,价值导向体现出人们共同具有的观念形态、反应定势、思维方式、认知范畴,是对人们行为准则的自觉规范与积极诱导。价值导向对社会存在具有强大的反作用,能够对人们的经济行为施加广泛而持久的影响。不同的价值导向对经济行为具有不同的制约力量,如儒家的仁义信条与近代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念就会以不同的方式切入经济行为,并且产生不同的客观效果。从最直接的意义讲,没有价值导向便没有经济伦理,而且经济伦理在广度与深度上的拓展最终都会通过价值导向的变化得以体现。

任何形式的经济伦理都是上述四大结构性元素排列组合、交互作用的结果,结构性元素的差异又带给经济伦理以不同的精神风貌。在不同文化圈之间,经济伦理的历史性差异通常体现为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差异。例如中华——儒教文化圈(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与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佛教文化圈的经济伦理即可进行比较研究,以探讨结构性元素的不同及其对经济伦理的影响。在同一文化圈内也存在着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差异,例如中国古代经济伦理与中国近代经济伦理,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经济伦理就有诸多不同之处。同样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还有社会分层带给经济伦理的差别,例如西欧中世纪的贵族与平民的经济伦

理,中国古代士阶层与农民的经济伦理等等,这些差别皆可从经济伦理赖以发育生长的结构性元素中获得诠释。

当然,经济伦理不是结构性元素的简单翻版,不是照镜子似的一一对应,而是结构性元素的化合物。故此,经济伦理是一种相对独立的认知对象,它起源于、依托于特定的结构性元素,同时又对历史发展具有巨大的反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四大结构性元素对经济伦理的影响不是均衡对等的,而是存在着轻重大小之别;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整合成为系统功能;不是僵硬的因果关系,而是存在着若干中介。比较而言,包含于生产方式之中的经济行为,包含于价值导向之中的伦理规范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对经济伦理的影响最为直接。如果说四大结构性元素为我们研究经济伦理提供了一个不规则的平行四边形的历史框架,那么,受制于这个历史框架的经济—伦理的互动关系则构成了我们研究经济伦理的入口。这意味着,在四大结构性元素与经济伦理之间存在着一个认识论中介,即经济—伦理的互动关系。

四、经济—伦理的互动关系

经济伦理探讨的不是经济行为对伦理规范的深刻影响,而是伦理规范对经济行为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植根于经济—伦理的互动关系之中,而经济—伦理的互动关系又植根于四大结构性元素之中。因此,对伦理规范反作用的研究必须廓清两个前提:一个是宏观的,即充分解析经济伦理赖以生存的四大结构性元素;另一个是微观的,即深刻把握经济—伦理的互动关系。鉴于此,我们对经济—伦理的互动关系予以揭示。

第一,经济行为(关系)是伦理原则(规范)的实践源泉和载体,伦理原则(规范)是经济行为(关系)的价值导向和目标。

人与自然的关系谱写了人性的序曲，这重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主要是经由人们的经济行为得以贯通、延伸。人与人的关系构成了人性的第二乐章，它的标题是“社会”。这重类的关系也主要是经由人们的经济行为得以定植、深化。工具制造、物质生产、劳动交换、产品消费是经济行为的原生形态，科学革命、产业更新、组织增生（如银行）等一系列生产力的裂变则是经济行为的次生形态。经济行为本质上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制约关系，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人性的对象化与自我肯定。经济行为的消失、虚劳或病态增长都将导致人的失衡与异化。然而，经济行为不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基础。当人类开始思索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时，伦理原则也就随之降临人间，并且在结构与功能上迅速成长为与经济行为不相上下的另一种文化实在。然后，它们相互渗透、水乳交融。

值得注意的是，伦理原则始终不能取代经济行为，它一直作为经济行为的原始动力与最终理想而存在。与凸现实践媒介的经济行为有别，伦理原则的典型意义体现在它具有面向现实生活的价值取向。这意味着，经济与伦理之所以能够实现互动，正在于各自的实践性。经济行为需要伦理原则的启动与疏导，伦理原则则呼唤经济行为的支撑与充实。没有伦理的规范，经济行为将是低层次的一般劳作；没有经济的铺垫，伦理原则只能是徒劳的劝谕、苍白的呐喊。

第二，经济行为（关系）与伦理原则（规范）的主体都是人，于是两者由互感而投入。

利益是经济行为的主体——经济的人追逐的猎物，人格是伦理原则的主体——道德的人寻求的目标。利益的最大化与人格的理想建构如何才能实现整合，这是经济伦理所面临的难题之一。无休止地追逐利益，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即物欲横流、拜金主义吞噬一切、人沦为精神乞丐。因此，在经济行为的背后，必须有伦理原

则的救赎与扶正。同样的危险也是存在的,即伦理原则的孤芳自赏会导致道德的人沦为生活乞丐,甚至背叛道德。于是,经济与伦理之间的互动成为一种合理和必须,成为人类健康向上的强烈呼声与内在要求。其实,完美的人起码应该是经济的人与道德的人合而为一。利益与人格之间并无绝对的对立与隔离,它们需要在与对方的关系中互相实现、不断提高。可以说,确保人的主体性不致分裂是经济伦理的奋斗目标,捍卫、丰富、完善主体性也促使经济与伦理的互动成为永恒。否则,历史发展的梦想将会支离破碎。

第三,经济与伦理的同步发展应该变成富有感召力的现实。

不平衡性经常骚扰经济与伦理之间的关系,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协调经济与伦理的发展方向、速度与模式,正是经济与伦理互动的重要内容。当然,不可忽视经济发展与伦理进步之间的差异,前者主要是社会生产力的发达,后者主要是人的心理素质的升华。经济伦理的优长之处在于,它既看到了经济与伦理的相对独立性,又能充分发掘、利用经济与伦理的内在功能与同化作用,从而为两者的同步发展规范了可能性的现实倾向。人的因素始终是经济行为与伦理原则的内核,利益最大与理想人格构架了人的二重矛盾性。这一状况既为同步发展的构想设置了障碍,同时又引发了一种难以排拒的动力。应该指出,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与伦理发展的实质性内蕴,它突出地映照经济伦理的终极关怀。在很大程度上,人的发展制约着经济与伦理的同步发展的可能性及其现实性,它是前提又是目的。离开了人的发展,也就偏离了经济伦理的主题,就会导致经济与伦理之间的欺罔与盲动。当然,同步发展并不意味着步调一致、整齐划一,而是强调相互之间的默契、通感与和谐,不致脱节。经济与伦理的同步发展可以视为评判一个社会或一个文化圈的发展是否畸型的重要标准,因为这也是人的发展的尺度。

第四,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经济与伦理的互动发生着从形式

到内容的一系列震荡与裂变,以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不是僵硬的一一对应,也没有不可把握的飘忽感,这是经济与伦理的互动向我们展示的一个常识。它们的互动是一种常量与变量之间的耦合振动,既相对稳定、又不断翻新。从经济伦理的角度看,经济与伦理的互动必须首先楔入一种肯定的形式之中。否则,它们就不可能确立相互之间的感应关系。在时代与人的演变历程中,这种关系必须主动地或相应地予以变更,重构原来的形式、扬弃固有的内容。不然的话,它们的互动不仅不能诱导历史的前进步伐,而且可能落伍于时代的大潮,直至淘汰出局。在经济与伦理的互动关系中,经济与伦理的作用不是绝对的,它们可以互相转化。有时,经济与伦理平分秋色;有时,经济发挥主导作用,抑或相反。总之,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合理化的自我扬弃、吐故纳新是经济与伦理互动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指出未来。

第五,经济与伦理的互动不是偶然性的相互刺激与制衡,而是一种合规律性的历史运动。

经济与伦理的互动是一种特殊的运动方式,互动的强度、方向、频率、结果充满了可能性与偶然性。远非机械的单摆。如果把视野仅仅局限于此,那么就会排除对经济与伦理互动关系的任何实质性理解。因此,必须由可能性与偶然性层面再往下切入,以便探赜索隐、钩深致远,获取规律性的精髓。历史与文化的奥秘正在于可能性与偶然性的活跃与多歧,经济伦理的奥秘亦复如是。奥秘的破译则是规律性的呈示。这意味着,既不应该绕开经济与伦理互动的可能性与偶然性,又不应该被其所缠绕。在绝对的意义上,经济与伦理的互动不受偶然性支配。否则,经济与伦理的互动只能是机缘与巧合的拼凑,而非必然。事实上,这种互动是合规律性的历史运动,它是偶然与必然的对立统一。

第六,自从人类社会迈入文明的门槛之后,经济与伦理的互动关系便打上了深深的阶级烙印,阶级性使这种互动关系富于尖锐